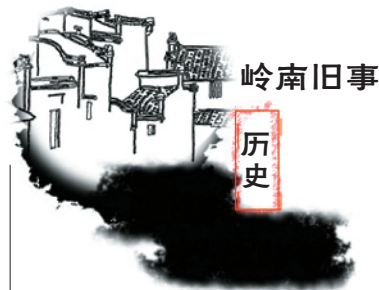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宋·佚名《槐荫消暑图》



海陆丰的“明清移民文化”

海陆丰地区即今汕尾市,著名侨乡。据不完全统计,现海陆丰的海外移民约100万人,著名港口有汕尾港、甲子港、乌坎港、大德港等,港连汪洋,先民赖海繁衍生息,走向世界,得风气之先,据舟楫之利。自古至今,海陆丰的海外移民活动一直十分活跃,不妨探求一下海陆丰明清移民的文化源流。

明初,为防止倭寇和张士诚残部,明王朝实行“海禁”。海陆丰沿海百姓迫于生计,偷渡出海。《海丰县志·明嘉靖志》载:“嘉靖壬子,海寇猖獗……而滨海之地,俱已弛备,贼每乘虚而入,如蹈无人之境,民甚病之。”海陆丰百姓既受“海禁”之苦,又受倭寇和海贼之扰,双重迫害下铤而走险,明代年间逃到日本南部、台湾、菲律宾、印尼、马来西亚谋生的海陆丰人为数不少。隆庆元年(1567年),澄海人林道乾为抗衡官兵打击海上走私贸易,在东南沿海四处活动。几经辗转,“抵达台湾北港、占城、吕宋、暹罗。最后(林道乾)率所部2000余众掌管北大年港(泰国南部)。”因此,海丰碣石卫三百余人随林道乾定居泰国南部。

1645年,海丰金锡都,杨安都一带农民和沿海渔民在郑亚长率领下,响应郑成功南下勤王抗清复明的号召,相继起义反清。最后起义失败,义军中一部分原为沿海居民者泛舟台湾或出走南洋,大部分义军则被清廷处死。出走南洋者秘密结社,倡“洪门”和“三合会”,回乡“反清复明”。

咸丰10年(1860年),清廷与英国签订《中英北京条约》。据汕头市地方志载:海丰1879年从汕头贩运到马来西亚种植园和矿场的海丰契约华工为428人。陆丰不止此数。香港是海陆丰人通往世界各地的南大门和中转站,由于清政府残酷镇压海陆丰的反清复明运动和太平天国运动,东南沿海特别是海陆丰人举家迁港,有的经港移居美国西海岸或东南亚一带谋生。另外,还出现了一批契约华工,部分海陆丰人被贩运出洋,到美洲、非洲和东南亚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。

(来源:广东文化微信公众号)

你以为古代能凉快些

清朝京城热死上万人……

在古代夏天也未必有多凉快。

在气象学上,一般以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℃作为高温的标准,如果多天在35℃及以上,称为“热浪”,属于气象灾害,古人称为“热灾”。摄氏度这个概念,也就百十来年来吧,那么问题来了,我们怎么知道古代有多热?

从《中国气象灾害大典·综合卷》的统计分析来看,热灾相对其他自然灾害并不是太多,与“霜灾”并列,约占总数的1%。著名气候学家竺可桢认为,在公元1900年以前,中国气候史上出现过四个“温暖期”,相应的也有四个“寒冷期”。

除公元前1100年之前的第一个温暖期持续时间很长外,其它三个总是交替出现。如从隋唐到北宋初年的第三个温暖期内,夏季极端高温天气就较多。

唐贞元十四年(公元798年),“春夏大旱,粟麦枯槁”。《旧唐书·德宗纪》上称,这一年“夏,热甚”。通俗说来,就是这个夏天太热了。



宋代刘松年的《斗茶图》将卖凉水绘入画中

五代后梁开平二年六月辛亥(公元908年7月17日),《旧五代史·梁书·太祖纪四》记载,这天是“亢阳”,意思是太阳太厉害了,也就是老百姓说的“毒太阳”。

这样的极端天气在北宋初年较多,而且宋代诗中多有描写。如孔武仲《伏中作二首》“酷暑已旬日,熏炙势自如”;陈造《立秋日》“酷暑如酷吏,顷刻不可对”……宋至道二年(公元996年),“六月,大热,民有渴死者”;宋景德元年(公元1004年)四月丁卯“隆暑”,六月壬午“人多渴死”。

在公元1400年以前,高温热浪天气涉及范围最大的一次,发生于南宋嘉定八年(公元1215年)。当时的皇帝是赵扩(宁宗),今河南、安徽、江苏、湖南等省份均遭受热灾。这一年又恰逢大旱,灾情严重。《宋史·五行志二》上有这样的记载:“五月大燠,草木枯槁,百泉皆竭。”

“燠”的本意是温暖,史书上称“大燠”,即“太热了”。因为对水的需求过于旺盛,“行都斛水百钱,江淮杯水数十钱”。放在眼下,这一杯水能值10元人民币,那时老百姓收入低,哪能喝得起“贵如油”的水?以致“渴死者其众”。

然而,南宋嘉定八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热的夏天,史上最热的夏天出现于清代乾隆八年,即公元1743年。从《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》第三卷“清代气象记录(上)”中可以看到,这一年高温几乎涉及半个中国,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、山东等整个华北地区异常炎热,可以说是超级酷

暑。有关乾隆八年极端炎热记录,在所涉地的史志上均有记录,兹录几条如下:

北京:“六月丙辰(7月25日)京师威暑。”(《续东华录》)

天津:“五月苦热,土石皆焦,檐顶流金,人多热死。”(同治《续天津县志》)

河北高邑:“(五月廿八(7月19日)至六月初六日(7月26日)薰热难当,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,日中铅锡销化,人多渴死。”(民国《高邑县志》)

山西浮山:“夏五月大热,道路行人多有毙者,京师更甚,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。”(乾隆《浮山县志》)

山东高青:“大旱千里,室内器具俱热,风炙树木向西南辄多死。六月间,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,路人多热死。”(乾隆《青城县志》)

由此可见,当时的整个华北地区完全进入“烧烤模式”。《续东华录》中使用了“威暑”来记录当时的高温,天气热得像发了威要吃人的老虎,来势凶猛。

这一年夏天,以北京的情况最糟糕。当时法国教士A.Gaubil(中文名“宋君荣”)正在北京,他在日后寄往巴黎的目击报告中写道:“北京的老人称,从未见过像1743年7月这样的高温”;“7月13日以来炎热已难以忍受,而且许多穷人和胖子死去的景况引起了普遍的惊慌”。

当时北京总共热死多少人?宋君荣引用当时朝廷官员的统计称,“7月14日至25日,北京近郊和城内已有11400人死于炎热。”实际被热死的人数当不止这些,加上其它地区,死人之众可想而知。

(来源:看历史微信公众号)